

Analysis of the German Film *Das Wunder von B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HUO Jia ZHANG B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31, 2023

Accepted: February 22, 2023

Published: June 30,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HUO Jia & ZHANG Bing. (2023). Analysis of the German Film *Das Wunder von B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2), 083–08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2.010](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2.01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2.010>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has gradually formed a boom since the 20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theory has continuously matur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search by famous scholars such as Jan Assman and Astrite El. The German film “Das Wunder von Bern” was filmed in 2003 while recreating the “Bern Miracle” of Germany’s victory in the 1954 World Cup. It describes the story of a family of former Nazi soldiers, showing the mem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after World War II, including not only the painful memory of his father, Richard Rubinsky, in the prisoner of war camp, but also the memory of the three brothers and sisters’ abhorrence of Nazi crimes and the memory of German fans who regarded the defeat as a shame.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 of rising from individual memory to collective memory, the different modes of cultural memory in the film “Das Wunder von Bern” are discussed, and the embodiment of the purpos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memory in the film is analyzed, and finally,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ilm is obtaine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is deepened. The analysis of the film “Das Wunder von Bern” is not only of literary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but also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cultural memory; World War II; *Das Wunder von Ber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HUO Jia (1989–), female, is currently an assistant of Sino-German Colleg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ANG Bing (1980–), female, is currently a lecturer at Sino-German Colleg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從文化記憶視角分析德國電影《伯恩奇跡》

霍佳 張冰

上海理工大學中德國際學院

摘要:文化記憶理論從 20 世紀 20 年代開始逐漸形成一股熱潮,隨著揚·阿斯曼和阿斯特莉特·埃爾等著名學者對研究的深入,該理論得到不斷的成熟與發展。德國電影《伯恩奇跡》拍攝於 2003 年,在重現 1954 年世界盃德國奪冠的「伯恩奇跡」的同時,描寫了一個前納粹士兵家庭的故事,展現了二戰後德國民眾對戰爭的記憶,其中不僅有父親理查·魯賓斯基在戰俘集中營的痛苦記憶即創傷記憶,還有兄妹三人對納粹罪行憎惡的記憶和德國球迷將戰敗視作恥辱的記憶。通過由個體記憶上升到集體記憶的研究方法對電影《伯恩的奇跡》中不同的文化記憶模式展開論述,並分析了文化記憶的目的性和發展性在電影中的體現,最終取得對影片更深層次的瞭解,也加深了對文化記憶理論的理解。而對電影《伯恩的奇跡》的分析不只是具有文學意義和學術意義,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文化記憶;二戰;《伯恩奇跡》

一、引言

20 世紀 20 年代法國社會心理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論集體記憶》是文化記憶研究的開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文化記憶理論被應用到不同的研究領域,且越來越多的被用於文學和影視作品的分析。

德國電影《伯恩奇跡》拍攝於 2003 年,是一部以 1954 年德國在瑞士世界盃奪冠的「伯恩奇跡」事件為藍本、重現德國足球輝煌時刻的足球題材電影。然而電影又花了大量筆墨虛構了一個同時期前納粹士兵家庭的故事,暗含了許多對於二戰的記憶,這些記憶貫穿於整部電影,成為電影的核心和主線,因此這部電影更是一部二戰題材電影。與其他同題材電影相比,《伯恩奇跡》並沒有把鏡頭對準殘酷的大屠殺、血腥的戰場、痛苦的受害者,而是通過含蓄地展現一些人對二戰的記憶來引發觀眾對二戰這段歷史的重新審視和思考。這些個人對於二戰的記憶是德國民族的集體記憶的體現,構成了對二戰的文化記憶。對這部電影中的文化記憶進行分析,不但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電影本身,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助於新時代的人們對於二戰這段歷史更全面的瞭解。

二、文化記憶

(一) 文化記憶的概念

「文化記憶」(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一詞是由德國學者揚·阿斯曼在 1988 年發表的文章《集體記憶

和文化身份》裡創造的。他為這個術語做了如下定義：文化記憶的概念包括了可重複使用的文本體、意象和每個時期每個社會特定的儀式。其概念的建立起到了穩定和傳遞社會自我形象的作用，基於這種集體的知識，每個群體建立起對過去的整體和特性的認識，並把其對整體性和個性的認識建立於這種集體的知識之上。

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建立在法國社會心理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基礎之上，其核心觀點是：社會群體的文化記憶根植於穩定的歷史積澱層中，以「詞語、圖畫、舞蹈」等非物質遺產形式進行「暢通的、具有象徵性的編碼或者演示」，並具有構建集體同一性的功能。然而文化記憶本身是跨學科的現象，揚·阿斯曼對文化記憶的定義只是基於媒介研究和文化歷史的領域。

20世紀90年代起，文化學和歷史人類學框架下的「文化記憶」研究在德國蓬勃展開。文化學對「記憶」的研究不是從神經學或者腦生理學的角度出發的，而是將記憶看成是一個和文化、歷史等範疇緊密相連的概念，它以關於集體起源的神話以及與現在有絕對距離的歷史事件為記憶物件。

（二）文化記憶的兩個層面

美國社會歷史學教授傑弗瑞·奧力克認為，「文化包括了兩種根本不同的概念，一是把文化看做存在人們頭腦裡的一種主觀意義，另一個是把文化看做公眾可從社會裡得到的具體化的象徵形式」。據此，德國研究文化記憶的著名教授阿斯特莉特·埃爾將文化記憶區分成個體的和集體的兩個層面，即個體層面和集體層面。

個體層面的文化記憶是以個人為載體，受社會文化環境影響而產生的生物學意義的記憶，在口傳歷史、社會心理學和神經學領域中研究的文化記憶就是從這個層面而言的。集體層面的文化記憶的載體是社會群體，以文化體系作為記憶的物件，歷史符號、歷史形象、習俗、節日、儀式、共同的過去都是集體記憶的表現。文化記憶的兩個層面能在學術分析上進行彼此的區分，但是二者在實踐中又有緊密的聯繫：個體記憶構成了集體記憶，集體記憶通過個體記憶體現出來。個人作為社會群體的組成部分，其回憶必然與社會的建構密不可分，關注個體記憶就可以作為研究社會結構與變遷的一個重要視角。因此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中對文化記憶的研究通常可以採用由個體記憶上升到集體記憶這種以小見大的分析方法。

（三）文化記憶的模式

針對過去的一個事件，不同身份的回憶主體、不同的回憶立場往往會有形形色色不同的文化記憶。阿斯特莉特·埃爾認為，過去是不斷被重構和重建的，因此我們對過去事件的記憶（個體的和集體的）很大程度上能變化。這不僅把被回憶的內容看成真實的，而且還把如何回憶的，即過去呈現出來的性質和意義看成真實的。總之，回憶相同的過去事件有著不同的模式。例如，戰爭能被回憶成抽象的事件（「戰爭史巨大事件」），政治史的一部分（「一戰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災難」），創傷的經歷（「戰壕、彈片、炮火網等的恐懼」），家族史的一部分（「我的叔叔參加的戰爭」），痛苦爭論的焦點（「由老一輩人、法西斯發動的戰爭」）。政治史、創傷、家庭回憶或代際回憶都是涉及過去的不同文化記憶模式。

三、從文化記憶視角分析德國電影《伯恩奇跡》

（一）電影《伯恩奇跡》

《伯恩的奇跡》（Das Wunder von Bern）以1954年的世界盃決賽為背景，講述了一段由無到有的父子關



係,以足球作為引子,牽出了二戰結束後的「創傷」主題以及德國戰後重建的艱辛歷程,影片成功再現了 50 年代德國足球的輝煌時刻。電影中的故事發生於 1954 年春天。赫爾穆特·拉恩是一名足球運動員,在德國埃森州足球隊擔任射手。因為實力出眾,被選入聯邦德國國家隊前往瑞士參加世界盃比賽。聯邦德國在小組賽第二場敗給匈牙利隊,但兩次戰勝土耳其隊,以兩勝一負的成績順利出線,隨後又打敗南斯拉夫和奧地利沖進決賽,再次迎戰勁敵匈牙利,出人意料的是,決賽中,聯邦德國力克匈牙利隊奪得冠軍,電影中的這場勝利,也就是德國歷史上著名的「伯恩奇跡」。

除了生動再現德國足球隊勇奪桂冠的精彩事件之外,電影還花了大量筆墨虛構了一個同時期前納粹士兵家庭的故事。11 歲的小男孩馬蒂爾斯·魯賓斯基是赫爾穆特·拉恩的忠實小球迷。他和母親克裡斯塔、哥哥布魯諾、姐姐英格麗特住在魯爾區,父親理查·魯賓斯基在他出生之前就被派往二戰前線。後來父親從蘇聯戰俘營回到了家中。理查帶著戰爭的心理陰影,無法正常工作,敏感暴戾的他還打了三個孩子,引起了全家人的不滿,大兒子布魯諾甚至離家出走,家庭陷入矛盾之中。理查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問題,聽取了神父的教誨,向家人說出了一直隱藏在心底的戰俘營經歷,之後父子關係打破了僵局。世界盃決賽前夜,父親理查叫醒了睡夢中的馬蒂亞斯,帶他前往瑞士觀看比賽。馬蒂亞斯到了決賽現場,此時比賽已經由 2 比 2 的比分進入下半場。拉恩見到了站在球場邊的馬蒂亞斯後倍受鼓舞,以一腳射門最終領先匈牙利,奇跡般的成為世界冠軍。最後一幕中,載著歸來英雄的列車在夕陽駛向地平線。電影暗含了許多對於二戰的記憶,這些記憶貫穿於整部電影,成為其核心和主線。

(二) 《伯恩奇跡》中的文化記憶——從個體記憶到集體記憶

將這部電影放到上述關於文化記憶兩個層面的理論框架中,不難發現它總是在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交替中展開,而不是僅僅停留在電影的演示層面。其中暗含了許多關於二戰的文化記憶,包括父親理查·魯賓斯基在戰俘集中營的痛苦記憶、兄妹三人對納粹發動戰爭罪行憎惡的記憶、德國球迷將戰敗視作恥辱的記憶,這些都是個體層面上對二戰的記憶,然而這些記憶所建立起來的關聯卻是二戰這段時期的德國歷史。也就是說,電影通過演示一些個體記憶,來指向和反映民族的集體記憶。相對於歷史教科書、圖書館裡的史料等等對二戰歷史的描述,電影的這種由小見大的表現手法可以讓現在的觀眾更清晰、更全面、更深刻的體會到二戰這段歷史記憶以及這些二戰經歷者和二戰記憶所有者的思想。

(三) 電影中不同的文化記憶模式

根據阿斯特莉特·埃爾關於文化記憶不同模式的觀點,回憶相同的過去事件有著不同的模式。在電影《伯恩的奇跡》中展現了不同人物對二戰不同模式的記憶,包括:父親理查·魯賓斯基在戰俘集中營的痛苦記憶即創傷記憶、兄妹三人對納粹罪行憎惡的記憶和德國球迷將戰敗視作恥辱的記憶。

1. 父親的記憶:創傷記憶

創傷記憶(Trauma)一詞最早出現在 19 世紀末的歐洲醫學界,表示某種心理層面的創傷,它的形成往往與危及生命的可怕經歷有關。如果這種創傷記憶不能得到及時的緩解和治療,則有可能長時間的影響當事者的人格和心態,並引發新的心理危機。創傷記憶有兩個特點,一是當事者在事後會有一段時間的潛伏期,其間他將無法與任何人談論和講述這段經歷;二是這段沉默期會最終結束,當事者會試圖解決創傷記憶所帶來的心靈傷害。

電影中的父親理查·魯賓斯基是一名在蘇聯關押了 11 年的戰俘,受盡了饑餓、勞累、疾病的折磨,二戰對於他來說最主要的就是一種非人的苦難經歷,這種經歷形成了他的創傷記憶。

回到家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他經歷了創傷記憶的潛伏期，他並沒有與任何人甚至是妻子談論過那段經歷，而是努力掩飾內心的創傷，儘量不去觸碰。這段時期內，他因受此影響無法正常工作，當進入礦井聽見打鑽機器「突突突」的聲音時，他不自覺的想到戰場上的槍聲和那段可怕的記憶，因而非常恐懼大聲慘叫。他的性格、情緒、心理也受到了創傷記憶的影響，變得異常敏感暴躁，總是與孩子們格格不入。

理查到政府部門領取戰俘補償金，工作人員說得知他在蘇聯犯偷竊罪和蓄意破壞罪被判5年徒刑，因此這5年期間內沒有補償金。理查解釋說是因為饑餓而偷了幾塊紅薯，工作人員說道，「魯賓斯基先生，規矩不是我定的，你也不是第一個抱怨的人，你應該慶倖。」理查感覺到自己沒有被人理解，他努力按捺的情緒失控了，「慶倖？我應該慶倖？你才應該慶倖，因為你沒有被抓到蘇聯去，沒有挨打！」這是理查第一次嘗試向別人傾吐內心的苦難，但是沒有得到對方的共鳴與同情，他的創傷記憶沒有得到緩解，因此引發了更強烈的負面心理問題。

在這種憤怒的情緒下他面對家人的態度更是不可理喻，與幾個孩子的關係在原本就緊張的情況下變得幾乎崩潰，大兒子布魯諾甚至離家出走。內心既苦悶又仁慈的父親決定找教堂的神父傾訴並尋求幫助：「我不知道怎麼辦，沒有辦法，我想把一切都做好，但是事與願違，現在布魯諾離家出走了……」神父很理解他的心情，告訴他：「我和很多戰俘交談過，他們大多數對過去遭遇的痛苦都感到羞恥，他們不讓家人參與，想表現的很堅強、勇敢，害怕家人看出監獄對他們造成的傷害……」經過這次談話，理查似乎變了一個人。在一個特寫鏡頭中，他充滿自信與力量地站在足球場上，然後騰空躍起倒鉤射門，球進了，他的臉上露出出場以來的第一抹笑容。與神父的談話是他的第二次嘗試，也是成功的一次嘗試，為之後第三次的徹底打開心扉埋下伏筆。

就在理查與神父交談的當天晚上，電影鏡頭為這個家庭渲染出一種祥和的氣氛，這時兒子向正在削土豆的父親問道：「你們沒有東西吃嗎？」父親用及其平和的口吻答道：「沒有，事實上我們的食物從來都不夠，蘇聯人自己也沒有什麼吃的，我們燒毀了他們的一切。」馬蒂亞斯認真聽著，並向父親投去敬佩和同情的目光，當收音機裡傳出他喜愛的足球新聞時，他起身關掉了收音機，回到桌邊繼續傾聽父親的訴說，正在熨衣服的女兒英格麗特也開始注意父親說的話。他接著說：「最重要的就是早上能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去摸摸旁邊的人，看看他是否還活著，或許還能用得到他的靴子。」忙著切菜的母親聽到這裡也停下了手中的活，「有時候他們會把那些不能勞動的人送回家。很多人就裝病，好讓自己回家。他們喝鹽水，慢慢的就病倒了，那些還能走路的人，都被派到工兵部隊去了，而我被派到西伯利亞的採石場。」馬蒂亞斯問，「你從來都沒想過回家嗎？」「我……都已經不相信能回家了，我就不再去想你們，只是想著怎樣過冬，怎樣找到吃的。有時候，農民會給我們點東西吃。有一次，一個蘇聯人帶我去他家，給我看了一張照片，那是他的兒子。我知道不該那樣對你，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做，這裡的一切都很陌生。還有布魯諾，那都是我的錯。」經過這段沒有太大情感波動的娓娓道來式的敘述，父親不僅徹底為自己的創傷記憶找到了出口，還坦誠地承認自己的錯誤，至此，他的創傷記憶得到了良好的治癒和清除。父子關係隨之得到轉折，父親在世界盃決賽前夜叫醒了睡夢中的馬蒂亞斯，開車帶著他開往瑞士伯恩。

2. 兄妹三人的記憶：納粹黨是發動戰爭的罪人

兄妹三人記憶中的二戰就是一場由德國納粹黨人發動的、給別的民族帶來災難的戰爭，因此他們對待前納粹黨人（包括父親）的態度是排斥與鄙夷。這種記憶模式在布魯諾身上表現的尤為明顯。

影片開頭部分有個母親和三個孩子圍坐餐桌吃飯的場景，禱告完畢母親問給布魯諾安排的的工作怎麼樣，他的回答是「我才不替前納粹黨的人工作。」從這個開頭可以對孩子們對於納粹黨的憎惡略見一斑。之後有一次，馬蒂亞斯一進家門就看到母親和哥哥姐姐端坐在桌旁，神情嚴肅，桌子正中央放著一封來自父親

的信。母親在全家到齊之後拆開信,之後因激動而哽咽著宣佈父親要回來的消息,但是兄妹三人的反應只是面面相覷,毫無喜悅之情,英格麗特勉強的擠出一絲笑容。母親問道:「怎麼了,你們不高興嗎?」布魯諾面無表情的隨口附和,「高興,高興(doch, doch)」而馬蒂爾斯只是一臉茫然。從他的茫然還可以想像出家人平時極少提及父親,顯然他們並不歡迎父親的歸來。

後來母親帶著孩子們在火車站等候父親。母親焦急的在人群中張望,尋找丈夫的身影,她說,「我只希望他好好的,誰知道蘇聯人對他做了什麼。」一旁的布魯諾卻認為父親是罪有應得,「蘇聯人,蘇聯人!蘇聯人會把德國人打得屁滾尿流,就因為聯邦德國無端去攻打他們!」在布魯諾看來,德國納粹黨發動戰爭給其他國家帶來了災難,而父親也是其中一員。

在迎來了父親之後,整個家庭都籠罩著火藥味。父親帶著戰爭遺留下來的心理陰影,而孩子們又保持著對父親身份的偏見,導致了父親與孩子的關係矛盾重重。父親在母親生日那天送了兄妹三人各自的禮物,送給布魯諾的是一個打火機,之後布魯諾發現它可能是父親在戰爭中的戰利品,這引發了他和父親之間的強烈的衝突。「他們就是這樣教你們這些士兵的?」他毫不避諱地對父親的前納粹身份進行了攻擊。被惹怒的父親打了布魯諾一巴掌,這場衝突導致了布魯諾離家出走前往東柏林。從這場衝突中可以更加明確的看出布魯諾對於二戰中德國納粹黨人的行為的譴責和鄙視。

3. 德國球迷的記憶:戰敗的恥辱記憶

電影中的一位德國球迷把德國在二戰中的失敗看做一次巨大的恥辱,由此他產生了對德國乃至對國家足球隊的悲觀、自卑的態度,形象生動地反應了部分德國民眾二戰後因戰敗而產生的心理陰影。在與匈牙利的決賽之前,這位球迷斷定「我們輸了戰爭,也會輸了決賽」;當匈牙利率先踢進一球的時候,他抱怨道「這麼早就進球!看來我們沒機會了」;當匈牙利 2 比 0 領先德國隊的時候,他失望的說道「我們會 0 比 12 輸掉的,德國人將會再次丟盡臉面,我回家了!」這位球迷對於比賽的預測和評判不是從兩隊實力的比較出發,而是明顯受到德國在二戰中失敗這段記憶的影響。

雖然有像馬蒂爾斯、體育記者的妻子、還有其他球迷這些深信德國可以贏得冠軍的人,但是有部分球迷還是免不了受到德國戰敗的影響,將之前的勝利視作幸運,將失敗視作必然。隨著比賽最終的勝利,德國民眾的民族自信心也隨之大大增強,並帶動了經濟的復蘇。

電影本身作為一種文化記憶的媒介,傳遞了二戰後德國人民對二戰的記憶。而同時電影又不只是如錄影帶一般對歷史客觀的重現,它帶有主觀能動的色彩,也有意識地參與到記憶的構建中。

四、結語

本文將文化記憶研究理論運用到影視作品中,通過由個體記憶上升到集體記憶的研究方法對電影《伯恩的奇跡》中不同的文化記憶模式展開論述,並分析了文化記憶的目的性和發展性在電影中的體現,最終取得對影片更深層次的瞭解,也加深了對文化記憶理論的理解。

文化記憶研究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文化記憶理論被應用到不同的研究領域,其中包括文學領域。而對電影《伯恩的奇跡》的分析不只是具有文學意義和學術意義,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注釋

① Assmann, J. (1998).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2. durchges. *Theologische Literaturzeitung*, 123(10), 929-942.

- ② Erll, A., & Erll, A. (2005).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skulturen: Ein kultursemiotisches Modell.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skulturen: Eine Einführung*, 95–122.
- ③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Vol. 5043). Basic books.
- ④ LU Chunying. (2022).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Take the China-US high-level strategic dialogue as an exampl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 153–159.
- ⑤ LYU Chenyuan. (2022). Review on movie subtitle translation over 2011–2020.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192–201.
- ⑥ Naumann, K. (1998). *Der Krieg als Text: Das Jahr 1945 im kulturellen Gedächtnis der Presse*. Hamburger Ed. .
- ⑦ Welzer, H. (2002). *Das kommunikative Gedächtnis: eine Theorie der Erinnerung*.
- ⑧ Olick, J. K. (1999). Collective memory: The two cul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17(3), 333–348.
- ⑨ 馮亞琳、阿斯特莉特·埃爾：《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
- ⑩ 馮亞琳：《記憶的構建與選擇——交際記憶與文化記憶張力場中的格拉斯小說》，《外國文學》，2008 年第 1 期。
- ⑪ 劉亞秋：《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對社會記憶研究的一個反思》，《中國社會科學》，2010 年版。
- ⑫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Editors: KCJ & JIANG Qing)